

## 文化传统与当下 鹿烁



◎当下小文谈

# 一位美国学者谈中国民主

□叶小文

关于中国民主,不时有来自西方的批评、责难。有的表露了用其政治制度的模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普适价值和绝对标准,来对中国照搬照套、削足适履的政治天真;有的则包藏着企图将“颜色革命”从苏东推到中亚、从中亚席卷非洲,再从非洲蔓延到中国,搞乱中国、颠覆中国的政治祸心。

但也不乏有识之士的客观分析。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就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民主”,符合其文化

传统和国情。而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是与西方“横向民主”不同的“纵向民主”。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

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很容易导致混乱,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

“纵向民主”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

其奥秘,就在于中国大力推行的“协商民主”。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观——人民当家作主;它与选举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它在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架起

了一道桥梁;它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当前,我们确保社会正常运转、应对社会矛盾凸显期挑战,完成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需要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并且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有益的民主实践,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学者,著有《小文百篇》、《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话》等多部著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编辑:王慧  
●美编:马晓迪



◎感悟经典

# 善恶只能在实践中见分晓



《论语》首章劈头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字通“悦”。这句话可谓是整部书的要枢所在。中国的“学”并不致力于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而是致力于人的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养成,所谓“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夏语)。“道德”即得“道”,即所谓“致其道”,也就是一个人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以达到道德的高度。

# 我不再是你们的“病孩子”了

我在接二连三的困难中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和豁达的精神,拥有了直面一切的勇气和执着,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财富。

□钟倩

亲爱的爸、妈:

你们好!今天这封信全是女儿的心里话,压在心底多年想说却从未说出的话。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贴身小棉袄,然而,我这小棉袄却有些“失职”。十六岁那年,一场大病使我中途辍学,病瘫在床,一晃就是十年。你们用三轮车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恨不能挖地掘鼠;你们成年累月地悉心照料,夏天蹲在蜂窝炉子旁煎药,冬天用药水给我泡脚,翻身、喂饭、端屎端尿,哪怕喝一口水也得端到我的嘴边。如果这种照料是没有期限的,那这将是怎样的“劳役”啊?经过治疗,我病情大有好转,能坐起来看书,还能用变形的手指操作电脑,写文章,自学。现在想来,没有你们的坚守,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怎样的感激啊?我常对自己说,我是一个不孝的女儿,拿什么来回报你们,这将成为我一辈子的愧疚。

我患病的第八年,爸也病倒了,直到现在还是插着尿管在床上维持生命。我知道,是我把你愁病的,累病的。为了给我治病到处借钱,你一听到有什么偏方骑上自行车就去打听,背着我们有时一去就是一天……爸,很多时候,我看着你躺在床上受罪的样子就想掉泪,尤其是夜里突然发病被120急救车送医院,生怕你再也不能回来了。你三次被抢救,都从死神那里绕了一圈,那边不留你,就是说你还有未完成的事:看着我长大。在你的鼓励下,从最初的书,到能写文章,从自卑、抱怨到走出残疾的阴影,拥有自己的梦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连我自己都不敢认识自己了。每一次我在报上发表文章你都十分高兴,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还悄悄地收藏在枕边。现在你病了还是这样宠爱我,虽然

你不能动了,但在我心中一样伟大。

妈照顾我们两个人,家里家外,没白没黑地连轴转,对于一个进入“知天命”的柔弱女人来说,是在透支生命维系这个家啊!你让我看到了母性的力量,能融化一切困苦,也能托起一切脆弱。我的电脑坏了,你二话不说抱着主机就去外面找人修理,还不停地嘱咐人家说,“千万别把里面的文档弄丢了,俺孩子写点东西不容易”;我看过的书籍,你再忙也要给我弄得整整齐齐,生怕我看时找不到;我和爸长年患病,但从来都是穿得干干净净,家里收拾得也有条不紊,连邻居都说,“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妈,我多么想替你分担一些啊,有时候在梦里都梦到自己能站起来走路了,能和你一起出去逛街了,难道这只是梦吗?医生说我的病已经是晚期,而你用爱感动了我,我的生命得以延续,我想,我也会用自己的坚持感动上帝,让我的梦成真,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爸、妈,我不再是你们的“病孩子”了,这是我最想对你们说的一句话。诸多磨难让我比同龄人提前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家庭的幸福和生活的真谛,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其余的得失不再重要;过去你们为我奔波和操劳,如今该轮到回报的时候了,还有什么比涅槃重生的生命更有力量 and 希望呢?书上说,大的苦难的好处是让小的困苦变得微不足道,所以说,我在接二连三的困难中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和豁达的精神,拥有了直面一切的勇气和执着,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财富。

爸、妈,我长大了,成熟、睿智了,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当然我也要拥有自己的幸福,要是哪天出嫁了,你们可不舍得啊!哈哈。

女儿钟倩

□何中华

据钱穆先生考辨,先儒即最早开辟了“习六艺”的传统,这里所谓的“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属于“技艺”,即动手能力和实践功夫。可见,早期的“儒士”并不是文弱书生,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只会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即“六艺”样样在行的人。

西方也好,东方也好,为什么人们都把道德看做实践的领域?因为善恶只能在实践中见分晓,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对于一个人的道德考量,人们更信任他的“做”而不是“说”。再者,道德属于目的性追求,善行本身不能被用来充当手段,不然就会丧失其道德的性质,而目的只能落实到实践中才能兑现。最为重要者,道德说到底不是“学得”的,而是“习得”的,只有通过实际地生活,身临其境,才能逐步“养成”一种道德人格。

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强调“践履”二字,其中缘由恐怕也正出于此,事实上这也格外分明地凸显了中国文化的道德偏好。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孔子反对巧言令色之徒,因为在他看来,“巧言令色,鲜矣仁!”《易传》也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因为“巧言乱德”。那种善于花言巧语而不务实笃行的人,足以败坏道德。

“学而时习之”,这里,一个“习”字,极为要紧。夸张一点说,中国文化笃实的功夫都蕴含在这里面了。“学”只有落实到“习”上,才是扎实的、可靠的,才是学习者自己的。说到底,这乃是中国文化“知行合一”的要求和体现。中国文化不注重“知”,不注重“说”,也不注重“论”,而注重“做”,注重“行”。我们常说,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我

们更信任人的“行”而非“言”。有人曾感叹:中国历史上有一流的思想家,就是没有一本讲逻辑的书;有一流的文学家,就是没有一本讲语法的书。这看似奇怪,实则正常。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文化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至于后来思想史上出现的种种流弊,诸如凌空蹈虚,坐而论道之类,是不能怪罪老祖宗的,只能怨后人自己把经典给读歪了。

早期的儒家是强调习礼的,由思孟学派开始逐渐偏重于心性一途,到了宋明儒则更因受援禅入儒的影响,独举“悟”的作用,越来越偏离了践履的笃实功夫。

对于儒学传统作脱离生活的诠释,不过是陋儒、俗儒所为,与儒家的真精神无关。梁漱溟先生晚年说:“不在工夫上去验证,事实上去说话,只从符号上去讲,终无头绪……要实地去做这种生活,方可以讲这个东西。要把它当做思想或哲学客观的研究,完全不能讲”。因为梁先生认为,“孔子所谓学问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不在旁处,只在他生活上”。这的确抓住了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精髓。

“学而时习之”的“学”是知识性的,而“习”是实践性的,是践履和体认的功夫。“学”以致其“道”。道德即得道,德者得也。“学”的归宿是得道,得做人格之“道”。“学”是成就人的道德人格的路径,但仅仅“学”还不够,还必须“时习之”,“习”在孔子时代是指习礼。《易传》曰:“履者,礼也。”而按《说文解字》,礼者,履也。显然,“礼”、“履”可以互训。按照宋儒程颐的诠释,“履,礼也。礼,人之所履也”;“履,践也”。“礼”是一种仪式,也是一套规矩,但都需要在具体的“做”中得以开显和落实。这是耐人寻味的。

道德说到底是个实行的问

题,是个证成的问题。在道德问题上,我们更信任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言辞。良知只有在“觉解”中才能澄明,良知也只有在“践履”中才能获得。所以,在“言”“行”关系问题上,孔子更强调“行”,也更信赖“行”。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中国的学问为什么强调的是亲在式的“体认”而不是旁观式的“认知”?说到底这是由中国学问的根本旨趣决定的。

中国的“学”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并不致力于对外部世界的解释,而是致力于人对自我所固有的良知的觉解,所以说“君子学以致其道”。

中国文化反对知行脱离,追求“知行合一”。学习就是生活,反对把学习同生活撇为两截,因为在中国人视之,脱离生活的学习永远不可能形成一种健全的人格。

总之,“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很好地凸显了道德的实践品格。败德之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不是出于无知,所有缺德的人都怕别人知道他们的劣行,所谓“小人过之也必文”,即文过饰非。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怕人知道,这当然有逃避惩罚、逃避谴责的考虑,但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只是自己未能遵照道德原则的要求去行事罢了。

所以,道德不完全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单靠灌输,效果极为有限。决不是通过听几堂课或者读几本书,大家就可以变成君子的。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道德只有在实践中逐步地养成,才是真正牢靠的。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